

数字化史料与史学研究效率

王 鹤

(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)

[中图分类号] K0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0-3541(2016)02-0075-03
DOI:10.13761/j.cnki.bflc.2016.02.014

数字化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基础材料——史料的重大影响,莫过于将原有的以纸质文本为主体的原始材料,通过数字化技术压缩、处理,形成了新的、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史料。张晓校教授将这种因科学技术进步生成的历史资料新的存在样态,称之为“新样态史料”^[1]。依据个人理解,这种“新样态史料”实际上是在说明“史料新的存在状态或样态”,诸多传统纸质文本史料,在数字化时代已成为“数字化了的”新样态史料。实践已经证明,这种原始资料外在形态的改变,提升了搜集、整理、占有史料的速度,对于历史学工作者不啻为一个“福音”。

信息时代、大数据时代,史料数字化速度、规模令人应接不暇,尤其是各种原始纸质文本“被数字化”之后,通过网络传播,提高了传播的速度,扩大了覆盖面。特别是各种专业化、专门化的数据库问世后,给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带来了诸多便捷,拥有了更多的主动选择的机会。伴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,网络传播速度的发展趋势无疑会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,必定使史学工作者加快搜集、整理资料的步伐。数字化、互联网、大数据时代等等,对人类日常生活、社会生产的许多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,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也是这一传统学科始料未及的。历数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各种影响,我们应注意的是对史学研究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。举凡治史者,史料为先,获取史料的数量、速度及时间直接制约着史学研究的效率。数字化及其由此产生了新型数字化史料样态,为治史者获取史料所创造的便利条件已经被实践所证明,直接促进了史学研究效率的提高必将为史学工作者所认同。

首先,整理、搜集史料效率的提升。众所周知,史料的搜集、整理、占有是历史学研究基础之基础,前提之前提,是任何论说、结论的依据、“证据”。历史学研究实践中,资料搜集、整理的速度、数量、耗费时间等,直接影响到研究效率及其实现。前数字化时代,各级历史学工作者对史料的搜集、占有方式简单甚至单一:或在书山文海中爬梳,或在故纸堆中寻觅。为穷尽史料,耗时费力是题中应有之义。至于效率如何,除了个人的学养天分和基本功之外,时间的堆砌不可避免,“无功而返”并不意外。此外,大凡历史学工作者所希望搜集到手的资料,多半带有稀缺性特点,得来不易,既有时间的限制,也有空间限制。例如,史学工作者所在地查阅不到某部、某本资料,不得不赴异地查阅。是否获得,另当别论,仅就时间的延长而言,自然降低了研究的效率。类似为人所共知的、传统史学研究的“常态”,有形与无形之中,制约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效率,或者说过多的时间耗费,无形中降低了研究的效率。当数字化技术逐步扩大运用范围后,尤其是网络技术的普及,许多传统纸质文本资料“被数字化”,各种传统纸质文本资料变身电子产品(最典型的是产品是光盘),短时间内穷尽史料变成可能,自然有利于研究效率的提升,从前需要异地查寻的资料,现在则通过网络在当地完成。尤其是世界史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,漂洋过海追寻某些国内见不到的资料,前数字化时代亦为正常。如今,借助互联网,足不出户,便可查寻、获得。一些世界史同仁感叹,从前闻所未见的资料,今天通过互联网轻而易举到手了。历史学的研究过程及其效率,固然不可简

[收稿日期] 2015-11-30

单地归结为史料的拥有与获得，但获得、搜集、占有史料的过程、耗费的时间等的确影响着研究效率的提升。数字化史料节省了搜集、整理史料的时间，缩短了过程，简化了程序，提高效率尽在情理之中。

其次，占有史料的路径便捷、快捷。历史学工作者搜集、整理、占有史料的过程是信息获得与处理过程，这个过程在信息时代之前，各种资料的整理是简单、繁复的手工劳动，且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定，比如，图书馆、资料室、档案馆等公共空间的开放时间不可能“全天候”，绝大多数不可能随时随地开放。但在网络条件下和数字化时代，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则被突破，史学工作者不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计算机查寻各种资料（图书馆网络化是最好的例证），而且改变了原来那种简单的手工劳动的种种局限，史学工作者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创造的便捷，提升阅读或查寻的速度。“多快好省”原则在历史学研究资料占有过程中是值得提倡的，历代史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中遵循着这一原则。然而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前数字化时代这种“多快好省”是有相对的，甚至是有限的。如今，借助网络，借助数字化技术，历史学工作者查阅、获得史料的速度是从前无法比拟的：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，以最快的速度指向搜索目标。专门性、专题性数据库的问世，使历史学工作者占有各种资料不仅“多快好省”，而且目标、方向明晰，事半功倍，省却了从前“大海捞针”似的各种艰苦的劳作。数字化改变了传统史料的存在状态，也改变了传输、储存的模式，历史学工作者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，把从前繁复的史料搜集、整理工作简单化、简便化，获得渠道多元化：微博、微信、网络、QQ等，无一不是获得、传输史料信息的快捷手段。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开启，各种与“微”相关的信息传递、传输模式无孔不入，也等于为历史学工作者搜集史料开辟了新的路径。

最后，“成本”降低。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，效率的提升与否同成本息息相关。历史学研究也需要成本的支付，不仅是时间成本，也包括了一系列的物质成本（此处暂不讨论历史学工作者需要付出的智力成本），只有这些成本的付出，方能产出历史学的各种研究成果。与前数字化时代相比，数字化形态的各种史料，在节约时间成本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优势。数字化时代，历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实践中，历史资料的搜集、整理、占有，在速度上有很大的提升，既可以通

过网络搜索，也可以充分利用新型的电子产品（以电子出版物为主导），为历史学研究服务。从前为了某条史料、某一本图书，鞍马劳顿地四处奔波，大多数情况下已被今天的一个光盘、一个网站、一个数据库所取代。网络、数据库、电子图书等，降低了史学工作者的时间成本，为提升研究效率提供了支撑。此外，许多公共网站向公众提供免费的信息资源服务，包括历史学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成为受益者，学术研究的成本支出相应减少，这与纸质文本时代各种资料的购置相比，无疑降低了个人、社会的购置成本。此外，新样态史料对史料搜集、整理、占有带来的“革命性”影响，还集中体现在信息——史料的贮存方式的变更上。一块小小的移动硬盘，一个光盘，一部电脑内存和云储存等等，所存储的各种信息堪称海量，为传统意义的书山文海式的信息积累望尘莫及。更重要的是，依靠这些现代化技术，不仅扩充了搜集史料的容量，而且便于携带、查寻，使用更加便捷。可以认为，新样态史料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，是提高研究效率的“快捷方式”。

依赖数字化、信息化技术生成的新型史料样态，对史学工作者的传统阅读、获取史料的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。首先，历史学工作者应正确认识、理解新型存在状态的史料——只是原始材料表现的、外在方式的改变——一种数字化技术的改变，需要改变原有的存在样态与阅读方式，但并不影响史料自身的价值。特别重要的是，由于获取史料的速度加快，历史学研究的效率必然相应得到提高，使史学工作者借助数字化技术的优势，加快研究步伐，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。有学者认为，电子阅读缺乏阅读纸质文本的厚重和感觉，但搜集史料本身最为重要的是获得支撑自己学术研究的“证据”，并不影响“厚重”。其次，面对形形色色乃至层出不穷的各种数字化、信息化产品，史学工作者应侧重提高自己的“搜商”。电子化、数字化样态史料的确为史料的搜集、整理、占有创造了条件，但能否“得心应手”，运用自如，直至促进历史学研究效率的提升，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实践中应具备两方面的基本素质：对基本技能的把握和“搜商”的养成。数字化、信息化改变了传统纸质文本史料外在形态，也一定改变着获得史料的技术手段。虽然蹲书斋、啃书本的传统不可废止，但掌握基本技能，养成“搜商”已成为数字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科学素养，甚至是数字化时代对

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一般要求。换句话说,没有基本技能,缺乏“搜商”,新样态的数字化、信息化史料,也难以和史学研究效率的提高结合在一起。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,历史资料的电子文本随之增多是不争的事实,历史学工作者查阅、搜集、整理、占有史料过程中,新样态史料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,通过“搜商”推进阅读速度,提高工作效率,进而提高学术研究效率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这在实践中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,关键环节是“搜商”。

当然,希望以数字化、电子化形态的史料完全取代传统的纸质文本史料,期待“超纸质文本”时代的到来,尚需假以时日。关于数字化史料及其阅读,许多人提出异议,认为纸质文本无可替代,认为电子阅读缺少了“读书”的意味。其实,笔者以为,今天所见某些新样态史料,许多内容仅仅“数字化了”的“故纸堆”,原始意义上的“故纸堆”只不过在数字化时代改变了存在形态,变化了外在表现形式,并未改变内涵价值,“故纸”的性质并未因“被数字化”发生改变。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,面对层出不穷的数字化产品,历史学工作者改变

(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,历史学博士)

阅读习惯是必要的。虽然不可以设想让拥有深厚钻研故纸堆传统的史学工作者变成“网虫”,但如果依然固守原有的研究模式、查阅资料的模式,也存在落伍时代之嫌。

本文所言数字化史料与史学研究效率的提高,仅仅以技术生成为视角,并非否定史学悠久的传统。比如,数字化技术为搜集整理史料创造的便利条件有目共睹,但真正提高史学研究效率依然不可漠视对史料的辨伪、考证、甄别、比较等历史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,不仅没有被消解,反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,彰显出比之先前更重要的价值。离开了这些研究方法,史料的可信度必然随之降低,研究效率无从谈起。因此,我们必须强调,数字化史料、新样态史料为提升史学研究效率创造了必要条件,但并不是充分条件。我们强调的是,历史学工作者在掌握了历史学研究基本方法后,尽可能多地利用数字化史料,进而提升研究的效率。

[参 考 文 献]

[1] 张晓校. 新样态史料与历史书写[J]. 北方论丛 2015(4).

[责任编辑 张晓校]

大数据时代对历史研究影响刍议

李红梅

(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)

[中图分类号]K0

[文献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000-3541(2016)02-0077-03

DOI:10.13761/j.cnki.bflc.2016.02.015

历史学的进步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历史研究当前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契机,这就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。大数据已经成为世界的本质和时代特征,对历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首先,从历史证据角度观察,大数据带来史料挖掘和阅读方式的革命,这是大数据对历史学发展最大、最重要的影响。历史学是基于证据的学问。如何获得历史证据——史料,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,也是最基础的部分。按照现代泛史料的

[收稿日期]2015-12-19